

·旧学与新知·

主持人：徐 雁

·拂云楼·

北宋以来福建私家藏书的特点

唐 曦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江苏南京 210093)

《庄子·天道篇》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便可追溯到孔子的春秋时期，从此私家藏书便开始了漫漫两千年的发展之路，在中国确立了私家藏书、寺院藏书、官府藏书与书院藏书为一体的藏书系统。纵观书林中已经问世的有关私人藏书区域研究著作，如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薛愈《山西藏书家传略》，瞿冕良《常熟先哲藏书考略》，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徐雁、谭华军《南京的书香》，江庆柏的《近代江苏藏书研究》等等，无不深受学术界尤其是文献学界的关注。

然而曾为全国雕版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建，却未见一部完备翔实的著作。以往仅有郭可光《闽藏书家考略》为200位藏书家作小传，萨兆寅《福建藏书家考略》介绍藏书家52人，因此，王长英与黄兆彰合著的《福建藏书家传略》（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版）和尤小平所著的《福建藏书家传略》（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版）的相继问世，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

福建私家藏书活动起步较晚，直到梁、陈间才有相关记载，在雕版印刷技术还未普及应用的晚唐之前，由于书籍多依靠文人学士一篇对一篇、一卷对一卷的传抄，私人藏书家要想获得并收藏大量书卷实属不易。直到雕版印刷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宋代之后，私家藏书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据《福建藏书家传略》的作者考证，藏书数万卷的福建建安人黄晞（996—1057）“为福建早期藏书家之冠，他在福建私家藏书发展史上，建立了第一个里程碑。”这一私家藏书风气发展至明清时达到鼎盛。总结这近千年的福建私家藏书历史，大致有如下六方面特点：

1 藏书家群以福州为中心

赵宋王朝在开封建立以后，改革并发展了科举制度，大力倡导尊孔重儒的社会风气，从而增加了社会对图书的需求量，而雕版印刷业的长足发展，又为之推波助澜。

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江西、福建便成为了这一新都的政

治、经济、文教“大后方”。朱熹（1130—1200）的理学学说在福建创立后，学风所至，对于福建等地的民间文教事业的兴盛，发生了有益的影响。与此同时，闽北雕版印刷书坊刊刻了大量图书，带动了整个福建地区藏书事业的发展，从而有“南宋之世，藏书家越、闽最盛”之说。

据王长英在《福建藏书家传略》中的资料统计可得，宋时莆田籍藏书家最盛，共39人，远多于建阳的8人，福州和邵武的6人。究其原因，是因为莆田地处东南，学风浓厚，许多人做官以后购书回乡刻书，促进了藏书文化的流传，从而出现了“方氏”这样的藏书世家。但到了明代，福州就已拥有藏书家25人，莆田和泉州的各8人，当初的建阳刻书之地却仅残存藏书家4人；清代差距则更为悬殊，在统计的186人中，福州一带的藏书家就有100多位，占了半数以上，莆田和泉州等地的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了。

顺着这些数字，不难发现，福州已成为历代藏书家的聚集之地，这与宋之后福建的经济中心转向福州有极大的关系。大批的仁人志士来到了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州，使福州聚集了大量的人才精英，加之闽北刻书业的衰落，这都大大促进了福州藏书文化的发展。

但令人疑惑的是，正如郑衡泌在《福建历代藏书家籍贯的地理分布》中所说的那样，闽北刻书业在宋到明时期都处于繁荣期，理应藏书家辈出，可据史料记载的却寥寥不已，此种原因还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

2 以刻书流芳书林

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讎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他指出：“于旧家中落者，贱信其所藏，富室嗜书看，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贋，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

南宋建阳崇化人余仁仲是建阳书坊中最著名的刻书家之一。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余氏世业之，仁仲最著，岳珂所称建安余氏本也。”其所刻书

“字划端谨，隄墨精妙”，于刻书、藏书、售书一体，成为宋代一藏书家。

明宣宗(1426—1435)时，光泽人陈盛举原为“新泰盛”书坊经营其分销店“鼎立轩”，为一书估而已。该店原属邵武曹家所有，后来他自立门户改其名为“杭川阁”，四出采购各地图书，不惜重金购买名家手稿、遗著、法书、图卷，收藏5000余卷。同时与福州大书贾谢明智合作，拓展店面，自造印刷用纸，增加印书作坊，还构建了藏书屋，随后雇请抄书、刻书名匠，精刻精印各种图书销售。其陈氏弟子也从这些图书中沾染了儒雅之气，形成了藏书读书的风气，更造就了“杭川阁育御史”的佳话。原来曾被公推为陈氏藏书屋总监督的好学之士陈泰，在28岁时应科举考试得中举人，后官至御史。他为官江西、四川、山东、苏州等地，不断购买书册，增益藏书。退休回乡之后，在教授子弟之余，还刻印书籍，编订了《杭川阁图书目录》。

再如明后期书贾余象斗(约1560—1637)，建阳崇化人。在邵武县学期间就开始涉足书业。其“三台馆”、“双峰堂”书坊，先后刻印了不少适应科举考试的参考图书，还编印了一些通俗小说，编刻了《列国志传》、《全汉志传》、《三国志传评林》等历史传奇小说。所刻书多图文并茂，吸引世人。清代的叶铭，被称为“闽北八书家”，是专文经营书业的大户，也撰有丰富的文章，但多散佚。

此外，许多藏书家虽不以刻书为业，但也或多或少地刊刻图书，极大促进了图书的流通。曹学佺(1574—1646)在石仓园中刻印出版家乡先贤的文集，徐延寿无不羡慕地赞其“所刊书充栋”；张燮(1574—1640)则以一部《七十二家集》刻本蜚声书林，将汉魏六朝之遗集汇于一编；郭柏苍(1815—1890)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刻书，一生刊印图书达二十多种，刊刻有《唐周补诗》、《闽中十才子诗集》等。

3 私家藏书多已散佚

据不完全统计，宋以来福建的藏书楼有百余座，较著名的有宋代吴与的“吴奉议书室”、郑樵的“夹漈草堂”；明代陈第的“世善堂”、黄居中黄虞稷的“千顷斋”、曹学佺的“石仓园”；清代的萧梦松的“名山草堂”、李馥的“居业堂”、郑杰的“注韩居”、陈寿祺的“小嫫嬛馆”、梁章钜的“黄楼”、陈征芝的“带经堂”、林则徐的“七十二峰楼”、郭柏苍的“沁泉山馆”、陈宝琛的“沧趣楼”等。

一些藏书家甚至有多处藏书室或多种名义的藏书处。如明代徐火勃(1570—1645)的藏书楼就有五处，分别为红雨楼、绿玉斋、汗竹巢、宛羽楼和偃蹇轩；清代林佶(1660—1722)除有藏书楼“朴学斋”外，另有“鹿眠庵”、“静寄轩”、“荔水轩”、“竹柏影轩”、“警露轩”等室；清代伊秉绶(1754—1815)的藏书室有“留春草堂”、“白雨山房”、“秋水园”、“寒玉斋”、“春及草堂”等。

虽然当时这些藏书楼显赫一时，藏书家们也精心收藏自己的藏书，希望它们能经久不衰，世代流传并惠及后代。但不幸的是，部分藏书因疏忽导致的火灾被烧成灰烬，部分因遭遇战火兵乱，导致楼毁书也散，还有些在藏书家去世后，被夫人或子孙变卖以接济生活，如此种种，都导致私家藏书难以保存下来。如明代陈第(1541—1617)去世后，世善堂内的所有藏书旋毁于夫人之手，浙江藏书家赵昱当得知有部分世善堂藏书被福建巡抚赵国麟长期借阅时，他就携款赶赴连江求购，可惜这批图书已经荡然无存了；再如清代陈寿祺(1771—1834)藏于“小嫫嬛馆”中的八万藏书，虽然其生前扃钥甚严，不愿将藏书外借，让藏书得以保存。但据郭白阳在《竹间续话》中说，陈寿祺的孙子陈培业曾在福州衣锦坊口设“缥緗馆”书肆，公开售卖“小嫫嬛馆”藏书，其中部分被郭柏苍和杨浚所收，而其他尽散。

可见纵有千卷万卷书，如果没有加以反复精读，这些图书一旦散之毁之，其间所赋予的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消散，岂不可惜至极？

4 藏本钤印留下图书流转印记

藏书印在藏书和藏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透过这个方寸之地，可以了解藏书家们的个人志趣，体现他们不同时期的读书心得体会，实为了解藏书家们读书、藏书思想的重要依据。宋代有关藏书印记的记载寥寥无几，但到明代就多见了。明代初期藏书印记多较简单，多反映藏书家的姓名、字号，如林鸿的“林鸿之印”、高均的“高惟一之印”、杨旦的藏书印“杨氏家藏之书”、黄居中的藏书章“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之后的印记就开始与藏书楼、室名相关，且藏书印常不止一枚，如徐火勃有“鳌峰徐氏宛羽楼藏”、“徐氏汗林巢集藏本”、“绿玉山房”、“晋安徐兴公家藏书”、“闽中徐惟起藏书印”。

到了清代，藏书印更是丰富。萧梦松有藏书印20余枚，有普通的如“萧印梦松”、“萧氏梦松静军”、“萧斋”等印，也有言简意赅、言其志的“澄之不清，挠之不浊”白方、“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朱方，其所刻的藏书铭更是被人津津乐道，曰：“名山草堂，萧然独居。门无车马，坐有图书。沉酣枕藉，不知其余。俯仰今昔，乐且宴如。”读来别有韵味，此番醉于书海，独享其间的精神境界让人艳羡不已。李馥则有“居业堂”、“过眼烟云”、“不贪珍宝”、“生事不自谋”、“舍书百不欲”、“书魔惑”、“见客惟求转借书”等60余枚印章，其视读书为人生之一大乐趣，视钱财功名利禄于身外之物可见一斑。

历来私家藏书的藏书印精巧清丽，雍容秀雅，凝重古朴，不仅可作为艺术珍品加以欣赏，其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时一藏本上钤有几方甚至是十几方印记，经过考证后便可获知此藏书的流转情况，如其曾被哪些人收藏过或被谁校对鉴赏过。

5 提倡私藏流通,推己益人

将藏书秘不宣人,一直是古代私家藏书的典型特征。藏书家们在藏书过程中都意识到得书之不易,藏书之艰辛,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能完好地保存图书,以达到“久传后世,津逮子孙”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将藏书扁其楼钥,使举世不得寓目,这是一个让藏书免遭破坏的重要途径。可是不难发现,每个时代均有藏书家将家藏秘本互通有无,加以抄写,与他人共读之的实例。尤其是明代之后,更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徐火勃主张“传布为藏”的思想,其所藏书多为罕见珍本,许多文人墨客不远千里来一睹其藏书,徐火勃皆乐于借阅,其在《笔精》中言:“书亦何可不借人也?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来借者,或蓄疑难,或稽异同,或补遗简,或搜奇秘。至则少坐,供茶毕,然后设几持帙,恣所观览,随其抄眷。”黄虞稷(1629—1691)“常与江左诸名士约为经史会,以资流览,借阅者无虚日”。有名的《古欢社约》就是黄虞稷和丁雄飞交流互借图书的证明,“每月十三日丁至黄,二十六日黄至丁。为日已订,先期不约。要务有妨则预辞”。梁章钜则认为借书与人是“推己之有余,益人之不足”,“其功似更大于通财”。

还有部分藏书家认识到只有教后代之学识,让其知藏书读书之重要,才能让藏书文化薪火相传,因此他们藉藏书以讲学,作育人材,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开办了多功能书斋、创立了书院。

陈旭,北宋建阳人,他将先祖建的“陈门藏书祠”改名为“双阳书斋”,内有藏书库、教书室、阅览室厅和刻书坊;郑元英在自家藏书楼“巢经楼”旁设私人图书馆“尚友斋”,供他人阅览;朱熹在福建许多地方讲学,在多处建藏书楼书院,如“经史阁”、“小书楼”、“同文书院”。明何乔远辞官后在家乡讲学,建立了“自誓斋”和“休山书院”;清李光地构筑“榕荫书屋”,在此教授弟子,为家乡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6 为读书而藏书,著述繁富

郑樵一生勤著录,明代的陈循在《寰宇通志》中称赞其“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他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不得不提,其在《通志·艺文略》中将古今图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编目。他认为书的分类要以书的实质内容为主划分大类,同类型之书应该归为一类,然后再细分小类,将分类体系扩充为三级类目,并可知已初具按学科分类的雏形,乃目录学的一大突破。他还根据自己的藏书收书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求书八法: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如此精辟的总结概要,在如今仍极具参考价值。

陈第曾言:“吾买书盖以自娱,特未及弃去耳,非积之以为了子孙遗也。子孙之读与不读,听其自然,至于守与不能守,亦数有必至”。可见,陈第藏书乃是为了自身著述之用,他编撰了《世善堂藏书目录》,并利用这些藏书研究古音韵学,撰著了《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音韵学方面的著作,虽为武将却也是一个学富五车之人,实在难能可贵。

徐火勃的《藏书屋铭》概其嗜书“生应不休”、“死而后议”的精神,他广聚图书,尤精于地方文献,参与了《福州府志》的编修工作,并且修撰了《鼓山续志》、《榕城三山志》等,还利用自己的藏书著成了《榕阴新检》8卷、《笔精》8卷、《荔枝谱》、《闽中海错疏》等数十种文献,对于了解福建地方文化作出了极大贡献。

提出创立“儒藏”的曹学佺,在《石仓文稿·建阳斗峰寺清藏碑文》中写道:“释道有藏,而儒独无藏,释道南北二京皆有版,道藏惟北京有版,以此见释教之传布者广,而奉释者为教之念公也。隋唐《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分为四库,宋《崇文总目》亦然,《文献通考》、郑夹漈《十二略》皆因之循名,责实未尝不与二藏相颉颃,惟是藏书家馆阁自馆阁,私塾自私塾,未尝流通,故其积之不久,或遇水火盗贼之灾,易姓播迁之事,率无有存者。……天下之物公则久,私则不能久。”这与其所处的时代来说,是相当先进的思想,他主张建立的儒藏,其实已经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模型,是先进藏书思想的良好体现。这在藏书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曹学佺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所著书有《天下名胜志》、《石仓诗文集》、《金陵初稿》、《西峰字说》、《周易可说》、《五经注解》等三十余种,所编书约有一千五百余卷,堪称一个大学问家。

谢肇淛则认为读书乃是为“明义理”、“资学问”,因此“为读而藏”一直是其终身抱有的坚定信念。他在《五杂俎》里批评了三种藏书人:一为仅为了让书架好看,使满架皆为装潢炫丽的书籍;二为尽心尽力收藏图书,却将藏书束之高阁;三为读书毫无心得,不懂得通过读书来解决问题。在当今社会这三类人仍不少见,在批判他人的同时,我们也需时刻反省自己,做到学问心中留,付诸实践方有余才是。谢肇淛读书重实用,他致力于编撰地方文献,编修了多种福建地方志。

此外,明代张燮编写了一部作为漳州与东、西洋各国贸易通商的指南《东西洋考》12卷、《霏云居续集》66卷、《初唐四子集》48卷、《闽中记》等;萧梦松有《西台奏议》、《理刑末议》、《道山纪略》、《史略》等;长乐的梁章钜创作了大量的笔记小说,题材丰富,有著作70余种,如《经尘》、《论语集注旁证》、《楹联丛话》、《归田琐记》等。

福建的藏书家们还整理编辑了众多的藏书目录。建安吴秘有《吴氏家藏书目》2卷、吴与有《漳浦吴氏书目》1卷、莆田方家的家藏图书曾被方略编了《万卷楼书目》1卷、郑樵编有《郑氏书目》1卷、陈第编撰《世善堂藏书目录》,打破传统的经史子

集四部分类法,而改为先将书分为经、四书、子、史、集、各家六大类,然后再继续细分为小类。还有黄虞稷编撰的《千顷堂书目》32卷,不仅仅著录自家所藏,收录了上至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作品,下至文人平民的野史杂记,所以在《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千顷堂书目》中说:“考明一代著作者,终是以书为可据。”其次他还补录了辽、金、元人的著作,使得从宋代至明末,有了比较完整的一代典籍的著录。

·皋兰台·

百家珍藏成渊海

——从《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到《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

徐 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湖湘为地灵人杰之邦,乃是文献学者所梦萦之地。去年秋间,竟得两度涉足:

第一次在10月25日下午,在长沙韶山路169号承湖南省图书馆雷树德副馆长陪看馆藏曾国藩书札亲笔。其中一本《曾富厚堂公记书目(副本)》,当时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陈裕新于1950年2月29日手书附识,交代其来历颇为清晰。

将近一个月后的11月20日下午,应邀出席在湖南双峰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遂得以前往荷叶镇富村,游观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素有“乡间侯府”之称的富厚堂。大屋院内左旁有曾国藩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亲自规划营建的思云馆,以及藏书十万余卷之求阙斋(又称“公记”书楼)等三处藏书楼。由此对于湖南的藏书史有了一个鲜明的个案印象。

今年夏秋间,虽无再行湖湘之缘,却有观书卧读之乐。大抵可供卧读者为北京文献学家郑伟章、姜亚沙所著《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岳麓书社2007年11月版),而所观之书,则为湖南省图书馆馆长张勇研究员任编纂委员会主任之《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线装书局2007年12月版)也。

两书恰好前者为源、后者为渊,构成历史文献在湖南的流转传承轨迹,高水平地填补了中国文献史在湖南一域的学术空白。

一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评介

郑伟章先生鉴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书,仅简单涉及湖南藏书家湘潭袁芳瑛(?—1859)、宁乡刘康(1814—1890)、巴陵方功惠(?—1898年前)三人生平事迹而深以为憾,于是通过在故纸堆里的长期考证求索,编撰而成本书。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凡25万字。著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总结湖南近现代文献史的特点有四,一曰“大文献家辈出”,

饮誉全国;二曰“重视整理乡邦文献”,形成优良传统;三曰“重视编纂、刊刻文献巨典”;四曰“重视书目题跋的编纂和版本、目录学研究”。由此可知,著述者宗旨,是在于通过三百年来文献学家事迹的编述,勾勒出湖湘学术史之脉络。

为此,著作者稽考评述自藏书万余卷的晚明伍定相(生卒年未详)、著书近百种的清初王夫之(1619—1692)以来,至“年方弱冠,即从坊肆游”的叶启勋(1900—?)、自称为“书淫”的叶启发(1902—?)之间,共计八十位文献家的生平传略、文献活动、藏本菁华、藏书读书刻书处所、藏书印记、书目题跋、纂辑编刻书目,以及文献散佚、传承源流等史实,并每篇尾注参考资料来源和引用文献出处,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甚便读者阅读和学者检索。其实事求是之学风,爬梳史料之工夫,令人叹为观止。

王仪通诗云:“巴陵方与归安陆,一样书林厄运过。雁影斋空题跋在,流传精槧已无多。”《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特重考证和交代诸家藏书流散方向。大抵或被毁坏无存,或卖入书肆再次流转,或为图书馆所收购、征藏:

赵慎珍(1762—1826)……为官四十余年,聚书十余万卷,不乏宋元槧本……其裔孙赵胜云:“先人赵慎珍藏书及手稿毁于倭寇”,即日寇占领常德之时。故今甚少流传。

曾国藩(1811—1872)……1954年4月,湖南省文管会派员接收曾氏藏书……所藏标记为“公记”、“朴记”、“芳记”三处。“公记”为国藩所读过之宋元旧槧、明清所刻所抄四部古书及方志、曾氏家族史料等。“朴记”系其长子曾纪泽所用之书。“芳记”系其次子曾纪鸿夫妇所用之书。第四代管书人王席珍女士谓,其父王子陵亦系曾府管书人。富厚堂有《书目》,厚达半米。其书除大部归湖南省图书馆外,亦有被曾纪泽携至北京台基厂曾宅,而毁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时。

方功惠(?—1898年前)……碧琳琅馆藏书多精本,质量